

1949.2

纪念景德镇解放40周年

解放景德镇

(下)

《景德镇文史资料》第七辑



89



本辑编辑：石奎济
许文质
陈海澄

景德镇文史资料

第七辑

乐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大32开字数：217千字 印数：1000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50元



出席江西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景德镇市代表

(胡明芳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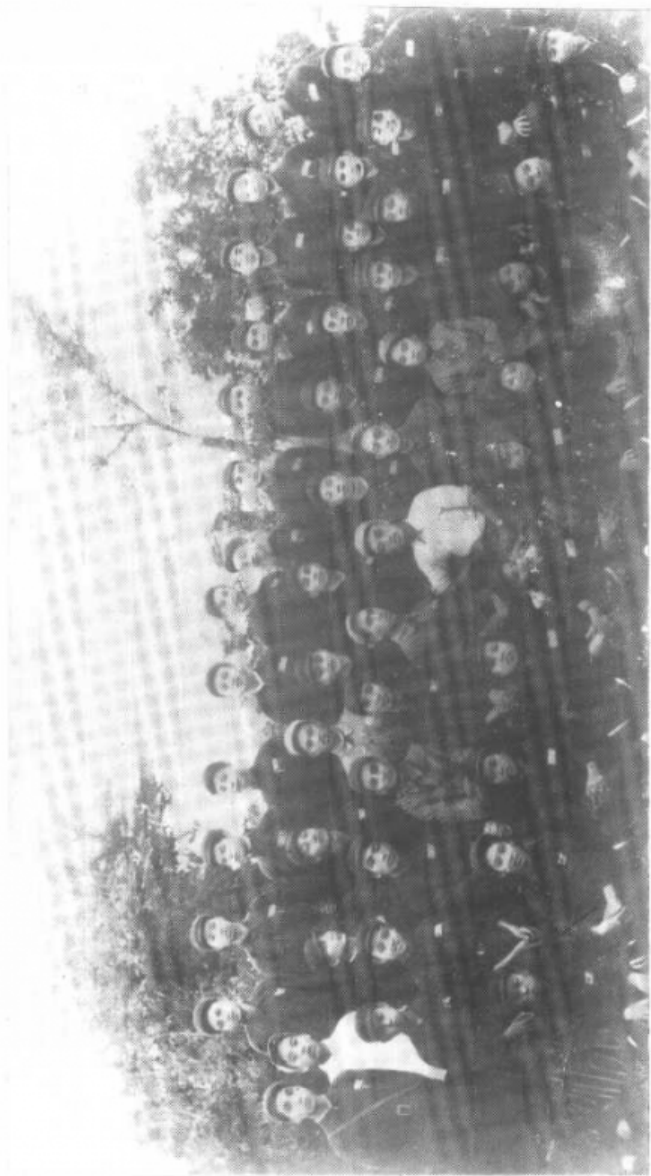
前排左起：黄庆荣 潘文伯 邓怀民 张云樵 张任之 孙泰英 何 燮 章 鉴 项振东
后排左起：孙文泮 余昭华 陈文辉 吕亮屏 任通文 方 昶 胡建民 胡怀陵 姜赞文



欢送张任之（张莉萍供稿）

蹲者左起：黄庆荣 张任之 李可时 崔全 崔云彬

立者左起：梁玉亭 陈仲达 刘一燕 贺福 胡志德 吉福桐 方政 孙文洋 武光祖 黄锦芳



市民主青联文艺工作团全体同志

(张世珠供稿)

刘耘仆在《景德日报》社

(刘耘仆供稿)



浮梁二区干部西进时留影

前排左一：姚桂 左二：李如川（李如川供稿）

目 录

率部起义 夜奔黄山	张剑超 (1)
忆当年解放瓷都	鞠世义 (12)
朱邦道的一枕黄粱梦	郑惟馨 (15)
李梓山中队投降经过	李如川 姚桂荣 (19)
追捕姚以南	吴让三口送 程光辉整理 (25)
血洒擅源港	卢振家 (30)
侦破活埋农会主席案	烈 夫 (36)
公安工作杂记	葛宝安 (42)
镇反运动概况	烈 夫 (46)
张任之在景德镇	张莉萍 肖赞润 (54)
我在浮梁工作时	王昌宇 (60)
干部情况的一点回顾	孙泰英 (65)
工人干部的成长	程振武 (69)
从学校到机关	涂世利 项文东 (74)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杂忆	余静寰 (80)
当年工会工作	程振武 (85)
妇联工作简况	徐碧莲 (98)
浮梁县土改试点	符鸿忠 (103)
洪源乡的土改复查	方炳仁 (110)
杨家乡的查田定产	方炳仁 (118)
翻身忘本的典型——王水盛	程承璋 (122)
工商联诞生前后	朱绍熹 程霍然 (126)
解放初期的金融工作	严 惠 (136)
人民银行的金融工作队	吴 超 (143)

紫阳中学会计班	王 敏(147)
余鼎顺瓷号复工	段本昆口述 陈海澄整理(149)
第一家国营瓷厂	熊真如 王 敏(158)
筹建示范瓷厂	李承汇(164)
创建烈军属瓷厂	杨 琨(170)
陶瓷美术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	吴康口述 杨瑞开整理(174)
裕民有限公司的“找窍门”活动	梁聚淦(176)
大器匣钵厂联营经过	方岐山(179)
浮梁县木炭精制厂兴亡纪实	程日安 李林荣(187)

文教系统军事接管简况	朱煜如 孙育乾(191)
解放初期我市教育概况	徐镇寿(197)
革命烈属子弟学校始末	王应谱 黄怀才(207)
职工扫盲教育	程振武(213)
农民扫盲运动	程光辉(219)

景德 日报 创刊 记	《赣北日报》末期	曹 伦(224)
	我和《赣北日报》	徐祥麟(227)
	《景德日报》创刊简忆	刘耘仆(233)
	《景德日报》创刊前后	徐 文(238)

青联文工团	冯献珍(242)
五所影剧院	曹长根等(245)
解放时的文化馆	乔 木(259)
解放前后的卫生事业	施文开(261)
五十年代的中医联合诊所	黄其波 孙景钟(264)

质疑·订正·补充

对《赣东北军政大学片断》的两点订正	徐 盼(269)
读《解放军到镇见闻录》问疑	梁 虹(269)
对《解放景德镇》上集的若干质疑	程振武(270)

率部起义 夜奔黄山

张剑超

我是从儿童团走上革命道路的，曾参与鄂豫皖、川陕甘两大根据地的斗争，踏过雪山草地，经历过夹金山、甘孜、会宁三大会师。不料在河西走廊与“马回”激战时，全军陷于绝境，不幸负伤被俘，受尽了人间牢狱之苦。后来，我逃出了虎口，又陷入了狼窝，总想另辟蹊径，立功自赎，以便体面地回到党的身边，殊途同归；但每每碰壁，功败垂成。

日本投降后，我从九江登小火轮来到景德镇。经同船的一位同乡向浮梁县长推荐，给我在该县的李梓山中队内安了一个分队长的职务。李梓山中队长驻瑶里，瑶里是我党领导的黄山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之内，这便给我提供了一个立功自赎的机会。

一、潜入我祁门游击区

我自到了瑶里起，就积极设法与黄山部队接通关系，希冀能早得到吾党的指示。可是，人地生疏，我的穿戴衣着又不相同，很难找到一点门路。先向靠近婺源的石井村探听，多是一问三不知。山区群众守口如瓶，避免多事。经我多方暗自打听，仅听说长岭有位名叫张满聚的人，别人都叫他张老六。有人说张老六很“狡猾”，见人说真话，遇鬼打乱哇。一天，听人说“张老六来了”。只见他长长的身材，鼻有点歪歪的，眼眨眉毛动。我不想放过

机会，约他到一边谈谈。我说了不少的话，他仅说：“从前我是参加过革命的，但早已断线多年了，如今什么也不知道”。我不能勉强他，顺便说：“听说祁门有位叫土佬的人，是一个很坚强的同志，你能不能约他偷偷来一下，我绝不会为难他。”我还严肃警告张老六：“今天我与你所谈的话，如走了半点风声……”，我即把手枪一拍：“谨防我这东西不认人的！”他即一再赌咒发誓，保证说绝不多言。我送他出门，望着他爬上长岭头。

过不了几天，他来到我这里。他说：“土佬有病不能走。”又悄悄说：“祁门的新四军是有，但白天看不到。”见他吞吞吐吐、含糊其词的样子，我说：“你对我放心吧？你如是同志，就给我讲真话，我不愿听假话。”他点头默认了。我请他给我带封信去，他答应了。我的信大意是这样几句话：

“土佬同志烦转交祁门地区党的负责人：我曾有个革命的经历，因受到历史的大挫折，沦于蒋区，而身在番邦心在汉，一向未能忘却慈母的教诲，忍辱含垢，旨在回到高堂之旁，尽到孺子微微的奉献……矢人。”

几天之后，接到署名郁达仁的回示，内容大意是给了我的安慰和鼓励，阐明当前政治大好形势，要我谨慎从事，做些应做的一切事。我真高兴得要跳起来！但我马上意识到，我还处在老虎嘴里，如稍粗心大意一点，立即会被老虎吞掉的。

自接任瑶里中队后，我就作了起义的各种准备。一是为了熟悉瑶里及其周围的地形地物，经常带着两个多分队的人，搞野外爬山越岭演习，借此摸清大小路径，便于将来杀回马枪。同时，经常出动，便于麻痹和疏忽敌人的警惕性，使习惯成自然。二是以友谊情份，积极争取彭培生中队长和独立营第三连邹副连长、郑排长等。到后来，我敢把转来的《黄山报》和油印传单交他们私下传阅。但这些人顾虑重重。我对他们说，形势在变化，绝不能等到“树倒猢猻散”。

有一天，张老六来附耳说，郁首长约定明天在社会山会面，要我能按时到达。我即考虑，如只身独去，敌人定会犯疑的，而带队伍同行，又难避开士兵的眼睛。如被敌人发觉，不但个人生命危险，而且会误大事。是夜，我辗转难眠。但我想，带队伍外出是常事，瑶里人是屡见不鲜的，主要还是如何能把自己的士兵撤开。

是日晨，与往常野外演习一样时间吃早饭。我指定司务长王久发带4个班随我行动，经长岭亭抵江家下，命令王久发他那4个班的人经谢家源到龙凤坑、小黄坑，再转到黄土岗一带游动。限定下午4时来到金村吃饭。我另带两个通讯员去金村筹备饭菜，一个去大马石代买鸡蛋，另一个派到荒田坞找保长着人搞饭。我即随张老六赶到中山村。适逢土佬（汪振丰）大儿子来迎接我，我们三个人一同通过石岭头，再赶到五里之外的社会山。

马文杰（郁达仁）、姚沉（姚政）同志，带着警卫队在警戒线上持枪在手迎接我。我上前行礼了举手礼，双手紧握着，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土佬同志给我一一作了介绍，随后入桌吃饭。没想到在这贫困的山沟里，竟为我备了鸡、鱼、肉等十个菜。我们边吃边谈。我把瑶里敌情和我个人的经历等，作了简要的汇报。首长对我指示：目下作起义的准备，听从时间的安排。指出瑶里是景瓷原料主要产地，如过早发动起义，会影响瓷城十万工人的生产和生活。那样，敌人会向瑶里增兵，对我们游击部队活动不利。我只能听从安排，临走规定了通讯暗号和交接点的记号。一是在瑶里对面长岭亭背后砖缝里插一根草作标记；二是在另一个遥遥半边亭的右后背壁缝里插草为点。这都是张老六约定的办法。

吃过中饭，我同张老六迅速赶到金村，可是，队伍开走了。我一时有些诧异，怕出什么问题。赶到江家下见到了队伍，我即批评通讯员：“你们跑到那里去了？到猴子源，方田坞，我一直

找不到你们。”为了糊弄他们，我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我还私下问了王久发几句，王久发说未发生什么事，我才放心带着队伍回到了瑶里。为了提高自己的警惕性，过了几天，我又以夫妻关系不睦为由，把妻子送出瑶里，安排在寺前对河的铁炉里住下，以备在紧急情况下便于转移。因她分娩在即，便委托詹文秀以保长的身份掩护她回景德镇娘家去，不致遭受敌人的残害。

二、率队武装起义

自社会山面晤党的负责人后，往来情报和油印传单《黄山报》等，都是由汪振丰（土佬）、张老六（满聚）传递的，交接点约定在长岭亭。这是一个野外高山岗上的空亭，四面荆棘丛生，过往人不多，对瑶里和长岭两头来人，在50米外便能看见，取放信件安全。对此能鸟瞰全瑶里的一切，我随时可去那里交转和取阅。

我除照常带队搞野外演习外，着重以友谊情份与独立营三连的方指导员（文化教员）和邹副连长、郑排长等加强交往，探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推心置腹地谈论国家大事。到后来，我除大胆地把《黄山报》和传单转交给他们私下传看外，我还在电话里两次约东埠中队长彭培生来铁炉里讨论起义问题。彭培生说，他三个分队长中，朱宗美是跟李梓山转的。天宝堂分队有困难。全队半数以上人枪可以掌握。我们把起义行动的暗号，规定为“下景德镇去”。

邹副连长和郑排长，对起义后的顾虑很大，怕起义后支持不住，会吃亏，认为形势发展不会那么快。我苦口婆心提醒他们：如等到树倒猢狲散，那就悔之莫及了。最后，他们只答应：如反攻瑶里时，保证一枪不打，开门迎接。这使我大失所望，悲叹这些人目光太短！

这时，景德镇的情况有了变动，乐平人许鹤当了专员，章浩

若为新任县长。这样，下面人马都要更动。对我怀有刻骨之恨的“国大代表”吴达中，就迫不及待地串通李梓山、张振英等，说：“新县长上任后，我头一张牌要打的就是张剑超！他持枪与我作对，先派兵抓我，后强杀了我家的猪，处处与我瑶里人作对。听说他有通匪之嫌……。”他不知张振英是我党地下人员。后来我在休宁流口见到张振英时，他才对我谈起这件事。

半月之后，就听说新县长已委派张高元来当瑶里队长了。看来已是时不我待。我即把胡兴发、王久发调进中队部，好枪亦收到中心碉，并动员爱人即回娘家去分娩，准备尽快起义。独立营三连的邹、郑二人还是徬徨不定。我放在乡公所的那位分队长黄××也不想走。住寺前的分队长毕云长是不可靠的。我住罗坑的那个班，则令他们从小坞里到长岭金村等待。临走前，我用电话给东埠彭培生“下镇”二字的暗号示意出动，他说：“你家镇上有事，希马上走！”我诧异，敌人真下毒手吗？是夜10点钟，我领着王久发这个分队和胡兴发这个班，经长岭至江家下，到海螺坞，意在等待罗坑那个班到来，但等到天亮后，仍不见人来。

天亮后，我带着他们到了社会山，我即写信告知郁达仁同志。在社会山吃了早饭，我令他们休息睡一觉。土佬同志同我一起到了棕里，王×培指导员带了两个排来迎接我们。翻了一座高山到了新胡村，郁达仁、姚沉、王克祁、张可钦等，为我们杀了猪，办了好几桌酒饭欢迎我们，并开了欢迎会。

第二天，我随郁达仁同志，经老榨里、拜堂石、右龙、源口到达婺源内诗村，谒见了熊兆仁司令员、余华政委。还见到参谋长赵×，他是从上饶集中营逃出来的，谈起来才知他原是四方面军的四川人。我向他汇报了一下浮东地区的敌情，也略讲了我的一些革命经历。第三天，仍从原路回到祁门的闾头村。郁达仁同志说：组织安排你担任祁门县人民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和政委都是郁达仁同志兼任。王久发在警卫连任排长，胡兴发任副排长。

多么不容易呵，我终于回到了党的身边，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

1949年4月16日，中共皖浙赣工委在古坦开会。我谒见到支队司令员倪南山，政委杨明。休宁县委陶刚、婺源县委洪海涛和祁门县委郁达仁等都与会。熊兆仁、余华二首长直接主持工委的工作。余华首长召洪海涛同志和我说：“张剑超同志调司令部搞参谋科长，他对浮东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可和吴启若同志带鄣西区警备队去石灰山、长溪开展工作。”这时，在收音机里已听到新华社的广播：“国共和谈议订的8条24款，如南京当局在4月20日以前仍不签字的话，我百万大军即刻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听到这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斗争的健儿们无不欢欣鼓舞，喜笑颜开！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奔走相告：“我们江北大军要过江了！”“顽固派完蛋了！”有的说：“渡江是军事秘密，怎能公开说4月21日呢？”另有人说：“我军力量强大，公开下战书怕什么？国民党在和谈桌上骗人，不接受教训，就打！还给他定个时间，这样，他们才知道人民军队的铁拳厉害呢！”

于是，古坦会议又增加了一个紧急的新内容，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的配合大军渡江。首在把根据地周围敌情和可能出现的动态，作了具体分析。并把皖浙赣支队主力部队移到徽屯周围，提早解放屯溪。另一方面，安排根据地人民群众为大军作支前工作，筹粮备柴，组织担架等。婺源不少乡还为大军做布鞋，编草鞋等。大家有分热，发分光，决心为南下大军献出一切。

三、迎接大军胜利渡江与景德镇解放

自鄣公山下古坦会议后，皖浙赣支队主力移向屯溪，与黄山部队一同解放徽屯二地。赣东北方面，除朱农同志所部在怀玉山活动外，婺源、浮梁一带仅只王宇、洪海涛和一个汤××营的兵力，

相机出击敌人。

我奉余华首长指示，同周继才、吴启若二同志，带着鄱西区警备队，到达石灰山即向浮东出击。那时浮东的洞里、瑶里、东埠、天保一带计有钟家梁的独立营和卢炳梁所属5个中队，还有一个浮东区公所，重点都在东埠街。我们一到石灰山即刻到距东埠5里之高岭，袭击了碉堡，并把伪保长捉来询问东埠敌情变化。

接着到长溪，即刻着手调查由黄沙坑经寿溪坞去墩口的道路。如控制住墩口，整个浮东敌人断了退路，便成瓮中之鳖。吴启若同志觉得有些冒险；我认为惊慌之敌，是没有战斗力的，当然也要量力而行。

这时，接到玉宇、洪海涛代表工委来信说：“我江北大军于4月21日横渡长江成功，在荻港至华阳一截，已南渡大军30万，正向屯溪、景德镇推进！已令赵建平同志即率鄱西区基干民兵300余人来配合行动，令采用多种办法，如放铳、鸣锣、吼叫，壮大军威，四面围攻敌人，迫使敌人投降缴械。另外，以附有中共皖浙赣工委指派的证明介绍信，直接与南来大军接头联系。”

4月25日，我们来到石灰山。赵建平的基干民兵到达了，即商议行动计划。吴启若、赵建平从水南山直插洞里，从背后攻打瑶里。我经程家门、坑上到寺前截击，到瑶里集中。到新屋下时，就得知瑶里的敌人在下午已开始撤退。赶到坑上、寺前歼获极少数之敌，当即把敌人几座碉堡摧毁掉，又搜查瑶里，把碉堡全都烧毁。这是反动派从苏区时代建起的堡垒，几十年来没有拔掉的“乌龟壳”，这次终被我们拔掉了！

吴启若从洞里出来时天快亮，就搞饭吃。到东埠那天，石灰山的民兵急着要烧掉驻过国民党的区公所的那座学校，吴启若同志默许这样做。我急忙赶去制止。有几个冒失者气冲冲指着我的脸说：“顽固派关人的区公所，为什么不能烧？难道留着它再来关押我们吗？不听他的，烧！”我说：“不忙。这房子是谁人动

手做的？砖瓦、树木来自谁手？拌泥、砌墙、扛料、挑土，又是谁？是有钱人出的力、流的汗吗？……”大家都说：“是穷苦人干的。”我又说：“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要不住房子？大家想一想，这房子该烧不该烧？”大家笑了说：“就不烧吧！”那几个冒失人也不说话，从而保住了这幢房子。

4月28日上午，我们抵达鹅湖街，群众放鞭炮欢迎解放。得知浮东敌人经渭水过河逃往柳家湾，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准备在鹅湖小憩后即往景德镇。

就在这时，靠打鱼生活的俞炳兴说：“臧湾到了五六十个八路军。”我一听就犯疑，八路军绝不只五六十个的。我决定先停下搞饭吃，并派人了解一下情况。即把民兵安排在下街拐弯巷子中休息，借此召开一个群众会，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稳定民心，说明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消除“八路军好说，新四军难缠”的误解。

我刚讲完话，就有人说“八路军到了”。我欣然走出门外，只见从小源方向的巷里走出来20多人直往天保堂走。我发现他们帽无军徽生了疑，即刻上前问：“同志！你是哪部分的？”一个家伙把眼一瞪，答：“我们没部分，怎么啦？”我即厉声说：“没部分是土匪，缴枪！”我的手枪响了。敌人吓得向街两边墙角躲，有的抢桥伏岸。我们有个石灰山民兵叫戴腊仿的举起手榴弹向前猛打，倾刻间，后面大批敌人的机枪小炮齐鸣。我们即利用下街头堤埂抵抗，把抢桥的敌人打了几个下水。

枪声炮声隆隆，我已知处在众寡难敌的包围中，即向东山书院后山撤走。在冲越小巷时，不料原所谓从臧湾上来的那五六个人占领了五间巷桥头那小山包的机枪响了，致使我们几个警卫战士和民兵在溪旁受了伤。冲上了山头又见由铁索桥去臧湾的路上有行进的敌人，只得拼命冲开敌人行列，爬上余家垅背后山头上，观察一下阵势。吴启若等被冲散了，只有何祖佑等四人跟着

我。至此枪炮声停了。同我们打仗的到底是什么人？未弄清。黄昏前，着人到鹅湖街上打听消息，但返回人说：“是八路军！”我即问街上是否有标语？有否召人开会？都回答说“没有”。我断定绝不是我们的军队。那天，我们几个在余家垅过夜。事后才知，是敌人刘汝明的九十六军从“江防”溃退向南逃命的。

鹅湖阻击战，使停止在锦溪一带的5000余敌人不敢前进。据说有个敌指挥官惊慌地说：“八路军的腿真长，又抄到我们前面来了！”他们找了个农民询问：“老乡！前面响枪的是老八路，还是新八路？”农民回答：“老总呀，老路，新路，我不清楚，只是这条路。”敌指挥官哭笑不得，只得把手向东一挥，5000多人爬上最高鸬岭尖露宿了一天多。第二天中午下山，经南安滩、东埠、天保再到婺源，从而使我二野追击部队赶到婺源城全歼了这股逃敌。人民群众说：“前面跑的刘汝明，后面追的刘伯承，追兵一拉火，退兵就投诚”！

我们返回石灰山，吴启若等由祁门棕里经右坑转来。周继才同志来到后，我和他又回到浮东。在瑶里、东埠、鹅湖、臧湾清理了残敌，召开了群众会，并把鹅湖、东埠几万斤稻谷民仓都贴上了封条，为二野部队解决了吃饭问题。

周继才同志曾到渭水与南下工作的李如川同志会了面，共同商议了关于解决潜伏在曹村岗、谢家源的李梓山、朱宗美的200余人的反动武装问题。李梓山、朱宗美是逃到过路港回头，经湘湖、渭水，不敢走大路而绕马家、小源到达曹村的。在我南下大军声威压力下，他们一时不敢乱动。詹子廉由镇来到瑶里。我即动员他去谢家源找李梓山面谈，促使他放下武器。而执迷不悟的李梓山还提出“招安”收编的要求，并说他已派人去屯溪找张振英，请他指派其侄张洪吉来“收编”，据说张振英已明确指出要他接受当地人民军队的处理。李梓山感到失望，谢家源没有粮食，才被迫把部队带到瑶里来的。